

文章编号:1002-980X(2007)09-0027-07

刘易斯模型及相关争论的评析

王恒彦

(浙江大学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杭州 310058; 孝感学院, 湖北 孝感 432000)

摘要:自 1954 年刘易斯发表其经典论文以来,围绕该文及其模型在一些基本而又核心的问题上都有很多争论。本文以刘易斯文本为依据,主要对刘易斯模型中两个部门划分、劳动力剩余与生存工资、古典主义方法论及模型中的福利问题等这些基本问题及相关争论进行了评介;并对基于刘易斯模型的发展,尤其费-拉模型的主要贡献进行了评论,在厘清他们之间的联系的同时,也对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些误解作了纠正。

关键词:刘易斯模型;两部门;生存部门;刘易斯拐点;古典主义

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志码:**A

1954 年,刘易斯在《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1]。在这篇经典文献中,面对当时大批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基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的考察,刘易斯提出了有别于当时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认为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传统生存部门和少量的现代工业部门,传统部门有大量边际生产力很低、为零甚至是负的剩余劳动力,他们对农业生产不仅无助而且是一种阻碍;传统部门的工人只能靠取得生存工资来生活;所以,城市现代部门可以以稍高于生存部门的工资得到大量的劳动力供给,现代部门的发展在传统部门的劳动力被吸收殆尽之前以不变的工资得到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从而能够持续地获得利润,保持发展。而一旦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完全被转移出去,则劳动力工资将大幅度上升,无论是传统部门还是现代部门都将以市场工资雇佣工人,整个经济就是一体的了,由二元转为一元。此即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或刘易斯模型。这篇文献奠定了发展经济学的基础,其结构主义分析范式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一直是发展经济学分析的经典方法。以后的很多研究者都沿用二元分析方法观察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取得了大量的成果。

但这篇论文也引起了很多争论,“1954 年我论述这个问题的论文的发表受到了同样多的赞美和愤怒的尖叫”^[2]。在批评与赞扬中,争论比较激烈的问题主要有:

两个部门的存在和传统生存工资问题;农业劳动力的生产效率问题,即传统的农业劳动力是否真的存在剩余以至于边际生产力微不足道甚至到负;古典方法论等等。本文主要讨论对刘易斯模型的相关争论并提出自己的理解。

1 关于两个部门的划分

对刘易斯模型的争论首先是两部门划分问题。刘易斯之后,很多作者对两部门往往会大而化之,或未明确其含义或含义模糊,多数就看作是农业和工业或城市与农村的二元,由此而带来的误解也很多。

刘易斯本人在文章发表后就曾深受人们这种误解的烦恼,针对人们的批评和误解,他要求大家更加仔细地阅读其原文^[3-4]。在 1954 年文章中,刘易斯所指的两个部门是“资本主义”和“生存”部门,而非工业和农业,更不是城市和农村。以后也有作者用“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区分的。刘易斯的这种区分是基于结构性考察,是一种生产和分配规则,而非其产品^[5]。两部门划分的适宜性是指像埃及、印度、牙买加等这样的不发达国家和/或地区,而非如英国或西北欧这样的发达国家和/或地区。从理论上,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不适宜这些不发达国家和/或地区,对其发展的分析应该有一种新的框架。

这种二元经济结构的主要特征是生产中要素使用的不一样,传统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使用

收稿日期:2007-03-29

作者简介:王恒彦(1970-),男,湖北钟祥人,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工业化、城市化与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变迁,城市和区域经济学。

土地而不用再生性资本,而资本主义部门则使用劳动力和再生性资本。收入分配上,资本家按劳动力边际劳动产品分配,而生存部门则是“产品共享”的分配方式,是所有成员都取得其维持生存的劳动平均产品。其背后的行为逻辑在于,资本家与传统的视雇员为雇从的雇主们有一个关键的不同,他们更具有商业头脑,对效率、成本和利润率有着更敏锐的意识;而传统生存部门更具有道德色彩。资本家的这种行为逻辑直接带来的就是经济中资本主义部门的不断扩张,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把生存部门中更多的剩余劳动力拉出来。所以是生产和分配特征而非产品区分这两个部门的。它们之间不是直接关联着工业与农业,很多国家大量存在的大农场、采矿业、大种植园因其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属于资本主义部门;而传统作坊式手工艺品生产以及城市的码头挑夫等则是生存部门。

将二元模型理解为城市与农村或工业与农业的对立可能与刘易斯模型本身没清楚说明两部门的空间区别有一定关系。在刘易斯看来,二元经济并非是雇佣劳动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孤岛”被大量的生存部门工人所包围,而是在一个生存部门占绝对优势的经济中,有许多这样的被环绕的“小岛”,他们以一种不同于传统生存部门的行为逻辑存在并持续扩张。而以后特别是托达罗的二元模型又明确将这两个部门安排分布在了城市和农村,这种划分与人们生活经验相结合很容易让人有一种印象似乎两部门就是城市的工业和农村的农业。刘易斯两部门划分抓住了二元经济对立的本质在于生产和分配方式而非产品形式,空间差异并不能产生经济的二元性。当然这一划分也为二元思想的发展留下了充分的空间。

2 关于生存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和生存工资

刘易斯模型中遭非议和攻击最多的是关于生存部门的一些基本假设:生存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生存部门劳动力的收入分配按照生存所需平均分配产品。

2.1 关于剩余劳动力

在1954年的经典论文里,刘易斯指出“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在那些人口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过多的国家里可以说是存在的,经济中的很大部门中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是微不足道的,零或甚至是负。”虽然农业部门里的这种劳动力剩余此前已经有

研究者提到了,但刘易斯强调的是“这种现象绝对不是仅仅存在于农村”,城市里大量的各种寻找零活的求职者也是这个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像挑夫、做零活的园丁(the jobbing gardener)等等,“这些职业有其需要的人数的好几倍,每个人都在偶尔的就业中挣得很少的收入;通常,其人数可以减半而不会降低产量。”这个论述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人们基于观察和历史事实进行了反复的实证,在正反两方面都得到了大量的支持性证据。

Nurkse 认同剩余劳动力的退出对农业产出的影响很小的观点:“其简单的定义(剩余劳动力)意味着一些劳动力可从生存农业中退出而不降低农业产出的数量。用技术术语就是,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是零。”他们或多或少靠平均分享农田里的总的产出生活,包括未达到边际产出的劳动力的产品以及土地和农民拥有的资本品。这些要素的产出都汇入同一口大锅,而家庭成员则吃完大锅的食物^[6]。Fei and Ranis^[7]、Harris and Todaro^[8]、Todaro^[9]对模型的扩展也是基于对这个假设的接受之上的。

森^[10]及其追随者^[11-12]也同意刘易斯剩余劳动力假设,并从另一角度给予了解释。即从总产出角度,认为剩余劳动力是在部分劳动力移出后产出不变的那部分劳动力,因为劳动力退出后可以通过增加劳动时间补偿,从而总工作努力及其农业产出不变^[13]。森的这个观点更应该理解为在农业劳动力转移后生产的重新组织,意味着技术的变化。而且,如果仅仅是通过农业劳动力增加劳动时间而牺牲闲暇其实不能就说劳动力的剩余。

舒尔茨^[14]从历史事实提出的批评是最具有挑战性的,他从理论和实证上都对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零的说法进行了反驳,特别是他提供了印度的证据,指出大部分农业人口从农业中退出将导致农业产出的衰退。但森对之进行了反驳。刘易斯所谓劳动力剩余是从绝对人数而非工作时间考虑的,是在现存工资下劳动力的过多供给,费-拉模型中超过边际产品的工资是最合理的解释,它即便不为零也是相当低的。在这样的生产力水平下,劳动力工资只能是平均产品:“在大多数人是农民工作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的经济中,……劳动力至少可得到的是农民的平均产品”。所以有必要讨论生存工资的问题。

2.2 关于生存工资

刘易斯认为传统部门工资特色在于收入共享,“这种经济中的劳动力价格是一种生存水平的工

资。”这种生存水平的工资更多是由风俗、道德等等制度性因素决定,受到地租水平的影响,不能简单地视为平均产品。森认为(在不考虑地租的)家庭农场中,在初始阶段,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并非按照其边际生产力进行酬劳。其成员平等分享产出,“工资”相应的就是每个人的平均生产力。即使支付“工资”,如给家仆的,也至多与其边际生产力是一种弱的联系,因为,“在人口稠密的国家,行为的道德象征使得每个人尽可能多的提供就业是一件好事,雇员与其靠山的界限很淡。”

刘易斯把劳动力剩余与收入共享结合起来的想法遭到了很多的批评。舒尔茨之外,Ootsuka 批评说^[15]：“在农业社区里,从来没碰到制度性决定的刚性的工资率”。

但正面支持的证据还是很多。人类学的研究支持基础性的分享消费的假设^[16]。经济学家 Ishikawa^[17]肯定了最低生存水平的存在,认为这是制度实际工资的一种形式,由“雇佣和收入分配的社区原则”决定,它保证所有的家庭收入不低于最低生存水平。Hayami Kikuchi^[18]用新古典的方法,发现印度尼西亚“工资调整不是在基于劳动力的边际产品运作而是按照当时和社会的风习要求的生存必要条件”。Osmani^[19]通过模型证明了工人坚持的分享原则会有向下的刚性。现代的行为经济学也从理论上对这一假设提供了某种合理化的理论结构,如果工人间的补助在缺乏有保证的互惠时,特别是在团体中的一些成员会随着时间过去而离开农业时这种平均生存水平工资的必要性。

那应该如何理解这种“生存水平的工资”?从字面看,生存工资就是低于它便不能生存,应该有一个自然的底线。然而,刘易斯并未把生存部门的工资看作是生存的最小需求。更为正确的说法,似乎他把非正式部门的工资看作是基础工资,比正式部门的工人的实际工资低。问题是,这个工资是不是不变的低工资,或者,它是否会随着该部门的就业工人的数量变化而变化。这一点,森^[20]解释并给予了回答,Leeson 也注意到了。在一部分剩余劳动力离开农业部门之后,留在生存部门的工人需要更加努力的工作,他们的回报相应是有轻微上升的。Fei and Ranis 的短缺点与商业化点之间的这个时期其实也是生存水平工资在相对上升时期。

因此,当发生经济增长而工人们被拉出生存部门进入资本主义部门时,仍然留在生存部门的工人每人都接受了比以前更高的收入,生存部门的工资

不必保持不变。进一步讲,生存部门的工资上升是资本主义部门最终吸收尽无限的劳动力供给的理由: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力供给价格将由于生存部门的机会工资的提高而提高。

对生存工资的理解应该是从二元经济模型的本质意义上来把握,这种生存工资只是要说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客观现实,再就是说明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不是新古典意义上的工资,而是外在于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力边际生产力水平。正如刘易斯指出的那样:“无论边际生产力是零或负在我们的发现中并非如基础般的重要……,而这招致了不相关的和放肆的争论。”Ranis 则称选择“劳动力剩余”这个术语是“不幸的”,并将批评看作是“红鲱(red herring)”而应该置之不理。重要的是,Ranis 写到,是“边际产品低,而且相当低到了低于讲价工资或收入共享的水平”。这才是本质的!

所以,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重在解释力而不是个别论断。这个方法的特征就是追求简洁和现实性,把传统工资“严格地与农业生产率……产生准确的工资和收入的数字……相联系,但是,获得精确性却丧失了实际性”。在《曼彻斯特学报》纪念 1954 年论文发表 25 年时,刘易斯对二元经济模型的有效性进行了深入的反省。在 1979 年论文中,刘易斯重新命名了两个部门,但保留了其原有的区分它们的结构差异,以更通用的术语重新对劳动力完全供给的假设进行了表达:“我这里使用的文本有三个特征。首先,有两个部门,下文称‘现代’和‘传统’,现代部门通过招募传统部门的劳动力而增长;第二,不熟练劳动力同样数量和质量的工作在现代部门比传统部门的支付要高;第三,在当前的工资条件下,供给现代部门的不熟练劳动力比该部门希望雇佣的丰富”^[21]。刘易斯在其三个论点下加了脚注:“术语‘剩余劳动力’没在本文中使用的,因为容易引起情感痛苦。但是,要传达的思想是一贯的,在现代部门的当前工资水平下,劳动力供给弹性是无限的。”生存工资是模型的支点,但这个支点是有弹性的。“传统工资依靠经济的状态而在一定范围里漂移”。从这个意义上,50 年后,在评价刘易斯模型时,Fields 说“传统工资的准确属性及其古典出身一直是围绕刘易斯模型争论的不变话题”^[22]。

当然对于刘易斯模型也有其他的争论,但仍然是围绕工资实际水平的差异问题而非对模型本身的解释力的挑战。如一些评论者就集中讨论了刘易斯模型的假设与实证观察明显的分歧。包括预测劳动

力从农业中退出对经济的影响,或在面对相同的增长时,传统部门的贫穷和不平等仍然继续。刘易斯本人更关心解释城市工资的上涨,他称之为“这一时期真正的理论困局”。他的回答也是二元性!工会和规模大的企业主的联合能使用规模经济,从而就较少受到来自小规模的生产者的竞争的困扰,可以强行限制在工资迅速上涨时招工。在小规模的部门,“生产力没意义……因为服务性的产出占优势……,这个工资有两个极端,那些极度繁荣和极度萧条的……最低工资由最低工资法,工会或生存水平决定”^[23]。制度因素再次在解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资上涨中起重要作用。尤为重要的,这些不构成对刘易斯模型的解释力的挑战。一些最新的研究(如,Amsden and van der Hoeven;Hoddinott;Levy and Newman)证明,一些非洲国家城市存在的黏性的高工资,被证实为暂时的。

3 费景翰和拉尼斯的扩展与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模型关注不发达经济的发展问题,即经济如何由二元走向一体化的一元。他认为资本主义部门以不变的工资吸收完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后,工人工资将出现一个陡直的上升进入一体化阶段,这个点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此点之后的农业将是完全商业化的,实际工资由竞争性的市场力量决定。

但这种突然发生的转折总让人难以接受,结合费-拉模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刘易斯拐点。

3.1 劳动力转移的三个阶段

刘易斯认为,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经济中,只要扩展性的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以不变而略高于生存部门的工资支付给工人,资本家就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工人使经济得以持续发展。而农业如何支持这种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转移,刘易斯没深入分析而只是简单地寄望技术进步。费-拉模型对于这种劳动力的转移过程进行了细致地划分。

费景汉和拉尼斯将刘易斯所谓的生存部门剩余劳动力称为“伪装失业者”(这个概念为刘易斯所认可)。借助这个概念,他们把剩余劳动力作了进一步的细分:边际生产力为零甚至为负的劳动力(“多余劳动力”,redundant labor force)和边际生产力不为零但低于其所获得的平均产品的劳动力。由于他们对农业产出的不同影响,在他们先后被转移出去时对经济尤其资本主义部门的影响就会不一样,由此就有了费-拉意义上的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边际生产力等于零的农业劳动力流出不影响农业总产出。他们的流出可视为他们将他们的那部分带到了现代部门,不会改变社会总的分配效果。但这部分劳动力完全被工业部门吸收后,工业部门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就并非绝对的“多余”了,他们的继续流出将影响农业部门的总产出,经济进入第二阶段。工业部门的继续发展将最终吸收完这部分的劳动力,在此之后,工业所需要的农业劳动力其生产力水平将等于甚至会高于刘易斯意义上的平均产出,这时候就是新古典意义上的劳动力资源稀缺阶段,工业和农业部门就出现对劳动力的竞争,工人的工资不再是生存性的“制度工资”,而是由市场决定的市场工资,经济将是完全的市场化,是一体的,发展中经济将转化为现代经济。第一、二阶段间的转折点为“短缺点”,因为此后由于劳动力的转移将出现农产品的短缺,而第二、三阶段的转折点称“商业化点”。

3.2 关于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实际上与两部门之间交换关系相联系,在费-拉看来,刘易斯本人在解释拐点时是相当宽松的,只要下述的事件有一个导致了水平劳动力供给曲线走到尽头,就可视为拐点发生了:工业部门的贸易条件恶化;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没有了。而在刘易斯那里,在封闭经济中这两个条件实际上是一回事。

费-拉认为,要解释刘易斯拐点,必须考虑一个事实:整个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是由非工业部门为其创造条件的。从实物意义上,工业部门实际所能够拥有的就业机会不仅取决于工业部门的就业创造能力,而且还有赖于供养工业劳动力的农业剩余(总的农产品剩余TAS或人均意义上的AAS),工业实际工资(应该等于AAS)从而工业就业人数是农业发展的函数。在进入第二阶段后,以AAS衡量的农产品剩余将出现短缺从而引发以工业品衡量的工业实际工资上涨,工业部门的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恶化,所以,农业部门多余劳动力的消失就是刘易斯拐点出现的原因,刘易斯拐点在静态时就是与“短缺点”的重叠点。费-拉认为,两个因素可以推迟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人口增长,而真正有意义的只能是生产力的提高,因为“剩余劳动力的消失必须解释为主要是市场现象而非物质性人力的短缺,其标志则是供给资源的实际工资上升”。

但是这个重叠点在劳动力供给曲线上并非固定

的,通过对农业投资或改变农业工人的劳动时间分配,我们可以改变农业生产函数从而使农业工人的边际生产力水平提高。这就是说,在农业工人不断释放到工业部门的同时,尚留在农业部门的工人的边际生产曲线会因其边际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外移,一方面这固然会提高农业工人的实际工资,而更重要的是,这会大大把短缺点的到来时间推迟,即短缺点会沿着劳动力供给曲线外移;另一方面,在农业工人消费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会有越来越多的农产品进入工业部门,从而 AAS 将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效应迟早会导致第二阶段即短缺阶段的消失,拐点将会与商业化点重合。因此,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将因农业边际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改变,在短缺点不断被推迟而越来越多农业工人被释放到工业部门的过程中,最终将会因农业部门的伪装失业者(不充分就业者)的消失而使短缺点不复出现,经济的第二阶段消失,拐点与商业化点的重合意味着经济进入一体化。

4 对刘易斯古典主义方法的评论

刘易斯的写作“采用的是古典传统,利用古典假设提出了古典的问题。”理由在于从斯密到马克思的古典派都假设了“生存工资下的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而资本积累在时间的演进中又会提高生产,古典体系用“商品间相对价格同时决定了收入分配和收入增长。”

人们在接受刘易斯对其论文写作的解释的同时,也对其分析方法进行了更深入的梳理。他的两部门划分及其不同的非对称的行为是有着古典主义的传统的。在理论的结构方法上,二元经济理论可以直接追溯到李嘉图的“两部门模型”。李嘉图的“谷物模型”中,工人的工资就是由“谷物”的价格决定的,是一种“生存工资”。当农业生产由于土地的有限性,使得适合耕种的土地越来越少时,“谷物”的价格会上升。这样,在整个收入份额中,资本家的利润会相对下降,这种趋势最终会使资本家的资本积累停止,经济增长停滞。李嘉图的两部门模型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代表,在两部门中,资本家所代表的部门不断地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而地主所代表的部门只是把所有的收入都消费掉。斯密也把生产划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只是斯密假设把这种“剩余”进一步投资到生产更大“剩余”的部门,并称之为生产性部门。这些部门也就是资本主义部门。斯密的这种看法又与法

国重农学派的观点有着渊源,只是重农学派的“生产性部门”是农业部门。

但对刘易斯而言,其模型更多是对古典传统的背离。首先,古典主义对两部门功能的界定与刘易斯是不同的。古典学派虽然有两个部门之分,但他们实际上把农业描述成了资本主义部门,拥有三个要素:资本主义的农场主(farmers)租用地主的土地而雇佣自由劳动力。地主通过新古典的边际生产率原则得到租金,资本家再与工人讨价还价分配剩余部分。地主只是一个废物般的消费者。而非农部门,得到资本主义利润的滋润,除了按照斯密的乐观主义观点外,并没被模型化。这里隐含着对非农部门的悲观,因为它们仅仅代表着暂时的避开了最终的农业停滞,在人口增长而又没有技术进步时,停滞仍将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没有可靠的技术变化时压榨尽资本主义的利润的必然结果。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李嘉图清楚看到了这点,尽管当时两个部门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革。

这些与刘易斯模型显著不同。其模型中的两部门世界虽也有如同古典学者一样重农主义(physiocratic)的影子。但农业是非资本主义农业,是生存部门占优势,只有两个要素地主和工人起作用,工资由讲价决定,会有道德、社会习俗等等多方面的考虑。某种意义上,地主不是消极的消费者,而是与大家一起劳动的生产者并对社区成员有一定的道德义务(黄宗智称为经营性地主)。在对待非农部门上,刘易斯更接近斯密。他同斯密一样看到了相对弱小的非农业商业化部门作为扩张动力的潜在作用,而且,也对通过生产力变革动员潜藏的农村储蓄更为乐观。Nurkse^[24]以及 Rosenstein - Rodan^[25]对这种农村储蓄曾进行过静态分析。地主被看作是储蓄阶级和潜在的商业和工业企业家。非农部门增长是充满活力和持续的,而不是如同古典体系那样,是对基础的农业的背离。

刘易斯强调的二元主义是组织性的,没有表达出产品的二元,对部门之间关系或者部门之间贸易条件的细节分析不在意。他主要关心劳动力的再配置直到拐点的到来。也就是说,劳动力再配置足以超过人口增长,二元萎缩,经济变成了完全的商业化。部门间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出清的贸易条件是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而刘易斯本人并不在意。

其次,刘易斯对二元演变的认识上超越了古典学派。首先,他关注从二元到一元的转变。在一元

部门里,现代经济增长是按照 Kuznets^[26] 传统,刘易斯强调组织性的二元主义及其转换,从组织化的二元到组织的同质,就是一种经济的进步和发展。也就是说,他看到了发展问题应该是强调经济体系运作的基本规则的变迁。第二,他相信在两个部门中技术的力量,只是没清晰地模型化。第三,他抛弃了古典派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者的传统。

第三,刘易斯对于两部门收入分配的看法与古典学派不同。前已指出,李嘉图对于技术进步,尤其农业技术进步实际持悲观态度,认为农业最终将无法支撑非农的增长。而在刘易斯看来,农业是有剩余来支持这种发展的。刘易斯模型描述的增长机制不停止的前提就在于农业产出也应该增加。“如果我们假定资本主义部门不生产食物,我们也就必须假定生存部门在增加其产出,否则,结论将是资本主义部门的扩张将因不利的贸易条件而耗竭其利润并最终结束。”从视农业发展为工业前提的角度看,刘易斯与古典学派有一致性,但双方对技术进步的看法不同。此外,刘易斯提出开放经济中通过进口克服食品短缺的可能性,这是其模型的一部分,也是古典派所不及的。但因其不十分清晰而常被人们所忽视。

刘易斯模型处理工资决定方式也是二元性的,强调传统部门共享生存水平工资,而现代部门在就业上是以非常新古典的方式决定:给定工资和资本存量,就业由边际劳动力产品决定。现代部门通过储蓄、投资、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把劳动力的边际产品曲线外移。工人们对于正式部门劳动力需求的上升作出反应,到那里在可能的范围就业。生存部门支撑剩余劳动力的生活而现代部门不存在失业,且工资水平不变,这就是其二元性的方法处理。模型的这个特征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无争议。

当然,今天对于农业与工业发展究竟孰为前提问题上还存在争论,但至少对于农业在存在技术进步时能够支撑起资本主义部门或工业部门的发展是达成共识的^[27]。刘易斯专注强调结构二元而不注意产品二元也给后来的发展留下了空间,费-拉等的发展就直接引入了产品的二元。

对于刘易斯采用古典传统的分析方法而放弃新古典方法批评最多的也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刘易斯抛弃了新古典的充分就业、市场出清和完全竞争的假设,意识到不仅是农业而且在城市的非正式部门,由于缺乏扩张性的合作资本而不是土地,只能以讲价而不是竞争性的工资为特征。新古典经济学家无

法接受不熟练的农业实际工资是外生的而不是内生地由需求与供给的相互作用决定的观念。这也构成了对刘易斯模型批评的主要症结。

对刘易斯采用古典方法进行写作其实不应该作为多么重要的问题提出,刘易斯对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关切,对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欠发达和低生活标准经济中问题的关注以及他本人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开创性研究才是吸引那么多学者对二元经济理论感兴趣的真正关键所在。在刘易斯看来,这些问题超越了经济学上新古典与古典的方法之争:“这并非经济学说史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将不会花费个别作者的时间来探询其意义,或评估其有效性或者是真理。我们的目的是按照现代知识复活其框架,并探究其能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地球上广泛区域的问题”。刘易斯对发展复杂性的认识,认为发展是经济、政治、社会和制度变迁的多层面的过程这种思想更具有启发性。

5 结论

本文对刘易斯经典论文所引起的部分重要问题的争论进行了评析。在上述几个问题之外,刘易斯论文中的福利和效用问题、减少贫困问题等都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因本文限制在对模型的讨论就不再评述了。从刘易斯的学术兴趣来看,他关心的是落后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福利的提高,二元分析方法只是观察视角或研究方法而已,这一点,Minami^[28], Ohkawa^[29]和 Fei and Ranis^[30]等都已经指出。刘易斯实际上对转轨增长理论、发展阶段以及正在兴起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都是开拓性的。

对刘易斯模型的发展除费-拉模型外,还有托达罗模型、乔根森模型及其它的发展,因篇幅和写作目的所限,本文不再作深入的讨论,但这些发展对于发展经济学的壮大和加深人们对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复杂性的认识都十分有意义,是整个发展经济学体系的组成部分,对它们的理解既能加深对刘易斯模型的认识,也能完整理解发展经济学。

参考文献

- [1] LEWIS W.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J]. 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4, 22(5): 139 - 91.
- [2] LEWIS W. A. Autobiographic Note[J].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ies, 1980, 29(4): 1 - 4.
- [3] LEWIS W. A. Reflections on Unlimited Labor[M]//L. E. Dimarco (eds.),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 Essays in Honor of Raul Prebisch.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2: 75 - 96.
- [4] LEESON P. The Lewis Model and Development Theor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9, 45
- [5] KIRKPATRICK C, BARRIENTOS A. The Lewis Model After 50 Years[J]. The Manchester School, 2004, 72 (6) : 679 - 690.
- [6] NURKSE R. Excess population and capital construction[J]. Malayan Economic Review, 1957(10) 1 - 5 .
- [7] FEI J C H, RANIS G.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 51 (4) : 533 - 565.
- [8] HARRIS J R, TODARO M P. 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A Two-sector Analysi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0, 60: 126 - 142.
- [9] TODARO M P.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9, 59 (1) : 138 - 148.
- [10] SEN A K. Peasant and Dualism with and without Surplus Labor[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6, 74: 425 - 450.
- [11] BHATTIA K B.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surplus labor [J].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79, 31: 403 - 414.
- [12] GANG I N, S GANGOPADHYAY. Optimal policies in a dual economy with unemployment and surplus labor[J].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87, 39: 378 - 387.
- [13] KHANDKER WAHHAB A, SALIM RASHID. Wage Subsidy and Full-employment in a Dual Economy With Open Unemployment and Surplus Labor[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5, 48: 205 - 223.
- [14] 舒尔茨. 改造传统农业[M]. 梁小民,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42 - 54.
- [15] OOTSUKA K. Book Review 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 from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1, 65: 237 - 241.
- [16] GEERTZ C. Agriculture Involutio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 [17] ISHIKAWA S. Peasant Families and the Agrarian Community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L. Reynolds(ed.), Agriculture in Development Theor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 [18] HAYAMI Y, KIKUCHI M. Asian Village Economy at the Crossroads[M].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 [19] OSMANI S R. Wage Determination in Rural Labor Markets: The Theory of Implicit Cooperation[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1, 34: 3 - 23.
- [20] SEN A K. Review of J. C. H. Fei and G. Ranis, "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Surplus Economy: Theory and Policy" [J]. Economic Journal, 1967, 77.
- [21] LEWIS W A. The Dual Economy Revisited[J]. The Manchester School, 1979, 47(3) : 211 - 229.
- [22] FIELDS G S. Dualism in the labor market: A perspective on the Lewis Model after half a century[J]. The Manchester School, 2004, 72(6) : 724 - 735.
- [23] LEWIS W A. Development and Distribution [M]//A. Cairncross and M. Puri (eds), Employment,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London: Macmillan, 1976: 26 - 42.
- [24] NURKSE R. 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 [25] ROSENSTEIN-RODAN P N. The Problem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Europe', Economic Journal[M]// Reprinted in A. N. Agarwala and S. P. Singh (eds), The Economics of Underdevelopment. Bomba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 [26] KUZNETS 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5, 45(1) : 1 - 28.
- [27] BHATTACHARYA P C. A Multi-Sector Model of LDC [J].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4, 41 (3) : 225 - 255.
- [28] MINAMI R. The Turning Point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Japan's Experience[M]. Tokyo: Kinokuniya, 1973.
- [29] OHKAWA K. Differential Structure and Agriculture: Essays on Dualistic Growth[M]. Tokyo: Kinokuniya, 1972.
- [30] FEI J C H, RANIS G. 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Surplus Economy: Theory and Policy[M]. Homewood, IL, Richard D. Irwin, 1964.

A Perspective on the Lewis's Model and Related Disputes

WANG Heng-yan

(China Academy for Rural Develop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Xiaogan University, Xiaogan Hubei 432000, China)

Abstract : After Lewis issued his classic essay in 1954, there have been a lot of controversies focusing on some basic and core issues. This paper bases on Lewis's essay and comments on some basic questions and relative disputes, including two sectors, labor surplus and the wage at the subsistence level, classical school foundations and welfare in Lewis's model. Furthermore, the paper also gives some remarks on the development of Lewis's model, especially on the contribution of Fei and Ranis model. The paper make the relations among these models clear and simultaneously corrects some long existing misunderstanding.

Key words : the Lewis model; two-sectors; subsistence sector; Lewis turning point; classical economics